

北宋易学

与变法思想研究

刘炳良◎著



人民出版社

北宋易学

与变法思想研究

刘炳良◎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易学与变法思想研究/刘炳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2822-1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周易》—研究—思想史—中国—北宋②政治改革—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B221.5②D092.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0090 号

北宋易学与变法思想研究

BEISONG YIXUE YU BIANFA SIXIANG YANJIU

刘炳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15 千字

ISBN 978-7-01-012822-1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宋朝同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而北宋又在其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宋易与汉易在中国易学史上并称双擎，其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窥测：一是宋代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上地位甚隆，远非其他朝代可比；二是在宋代经学中，易学又是最为发达兴盛的一个方面。

任何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在继承以往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与所处时代社会政治的演变、发展息息相关，因而也就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易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治国安邦的政治需要。

在北宋变法改革思潮的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周易》及易学的启发和影响。《易传》是北宋易学和变法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的研究和运用是北宋变法思想发展的重要载体。北宋的儒家士大夫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易传》和易学的启示、影响，将《易传》等易学著作当作最为重要的资鉴和依据，用以构建自己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政治改革思想的形成和提出以及改革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推行，都是通过对《周易》的诠释、阐述和易学研究来完成的。源于《易传》所倡导的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精神而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易学思想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北宋士大夫们的学术风格和政治思想。《周易》和易学思想成了北宋变法改革思想演进的理论基础和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思想武器。而研究和考察北宋儒家士大夫们的学术体系和易学思想，又总是能看到他们“以忧患之心，思

忧患与故”，“急乎天下国家之用”，致力于变法革新，推进政治改革，以求匡扶社稷、经世济民而奋发图强的影子。可以这么说，易学思想的发展演进与变法改革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实践交织在整个北宋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北宋独特的易学学术和政治文化风格，并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北宋变革之际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多姿多彩、既古老又常新的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

《周易》兴于殷衰周盛之时，为圣人忧患之作，其卦象和卦爻辞中包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宋代的洪迈说过：“《易》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经过《易传》的深入阐发，这种忧患意识变得更为深广、更为浓重，在清正的士人那里逐步形成成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成为一种理智的、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这种忧患意识的主旨在于，人们要以戒惧而沉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时刻抱定警惕心和危机感，事业顺利时不掉以轻心，能透过升平气象的背后来洞察隐患，居安思危。遇到艰难困顿时不气馁、不屈服，要树立自信心，通过自我反思而拨乱反正，化险为夷，使个人、家族和国家求得光明前途，并从中锻炼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

在《周易》看来，要消除各种忧患，最根本的在于革故鼎新，进行汤武革命那种“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落实到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上，实行变法改革。北宋时期，许多怀着深广的忧患意识的易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针砭时政，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主张和设想。应该指出的是，许多改革主张就其思维方式、思想内容来说，《周易》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有些思想还是通过解《易》述《易》表达出来的。这种本于《周易》的忧患意识在北宋的易学家、思想家们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每当社会危机日渐显露而个人挽救危机的才智又难以施展时，这种忧患意识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面对承接唐末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以通变、应变为宗旨的《周易》就成为北宋士大夫们应对危机，推行变法改革的思想武器，北宋易学也就势必走向兴盛。从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到欧阳修

主张的“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从王安石提出的“法先王之意”到司马光服膺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立纲布纪”；从胡瑗坚持的“明体达用”到李觏的“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从程颢、程颐发明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随时变易以从道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学理想等等，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思想，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要求最高统治者时刻抱定危机感、警惕心，居安思危，慎终敬始，养贤蓄才，革故鼎新，振作朝纲。“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

《周易》和易学研究的关键是要有思想，有思想才会有宗旨。我们一直主张，应该摆脱传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束缚，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受《周易》及易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学术文化现象上来。易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周易》和易学启示、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曾经研究易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张，而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是有所师承的易学家，不管这些著作是否是专门的易学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把握易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认识、解读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现象，从而推动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同时，易学思想研究要适应和符合易学自身的发展和特有规律，不能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因此，易学研究应当超越经学领域或儒学领域，将考察的视野投向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易学应当有符合其历史实际的独立地位。

炳良博士数年前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他为人纯朴厚道，真挚赤诚，为学勤奋踏实，谦逊谨慎，将主要精力放在易学文化与变法思想的研究上，最终撰成《北宋易学与变法思想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他的费心费力之作，在翻阅大量史料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反复推敲修改而成，得到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顺利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呈献给各位读者的这本书，就是以该论文为基础经过充实、完善而完成的。本书大量占有和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认真吸收和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北宋时期易学与变法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立意新颖，视野开阔，重点突出，脉络

清晰,论述充分,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历史线索和逻辑线索的结合都做得较为成功。

作为北宋易学思想与变法改革思想的综合研究,本书涉及易学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多个领域,在宏观方面,本书尤为关注北宋社会政治变法改革和儒学复兴运动思潮的大趋势,注意到易学与社会政治史、学术思想史的互动关联,将易学置于时代大背景下加以系统考察和探究,以变法改革的纵向发展为经线,以变法人物的易学思想和改革思想为纬线,充分发挥了易学研究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在微观方面,则对北宋时期易学研究、运用和变法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缜密、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且重视发现和使用文集、笔记、奏折、实录、起居注中的新史料,不乏新意,颇见功力,多有独到之处和精彩之笔,弥补了以往易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基本勾勒出了改革派易学与变法思想的完整体系,有着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本书总结出“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的核心命题及其所体现出的“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思想纲领,就是在北宋社会的各个重要方面一以贯之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宋代的立国之本。这个看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有关易学思想的范围,涉及到如何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对中国文化作出合理定位的问题,这是一个近百年来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这个看法虽然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是其本身发人深省,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另外,本书尚有一些小的缺憾。一是宏观驾驭能力不够娴熟,在选题范围上横跨整个北宋,涉及人物、事件较多,难免顾此失彼;二是微观探索不够深入细致,细节的衔接处理得不够圆融,对关键人物学术思想的挖掘不够充分深入;三是研究范围尚待拓展。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期待着炳良博士今后有新的努力,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包括功利主义学派在内的南宋易学的研究。

通观本书,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专业研习和工作实践,炳良博士已经具备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治学严格遵守传统学术路数和学术规范,同时注意

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注重原创，使全书体现了可贵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表现出良好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都较为突出。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将会大大有助于中国易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以及北宋变法史研究的开拓和深化。在此也衷心祝愿炳良博士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征程上与时偕行，精益求精，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为包括易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张 涛

2015年冬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

前 言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范围

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周易》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是我国现存最为古老的文化经典，也是中华思想文化最为重要的源头活水。易学思想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潮、主旋律。我们通常所说的《周易》是包含《易经》《易传》、易学三个部分内容在内的一个宏富体大、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易经》形成于伏羲到文王的这个时期，这时的《易经》还是一部有关巫术和宗教的书。但蓍占也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所以这部“卜筮”之书中，又包含着“古之遗言”，即远古祖先的生存智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等古圣先贤不断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周易》，将之诠释成了哲学书，《易传》就是形成于孔子及其弟子之手。《周易》成了儒、道等诸家发生学的源头，而儒家、道家等诸家学说在给《周易》注入了新机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周易》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的深刻影响。易学成为综合百家而又超越百家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易学哲学自战国末年形成之后，便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中高居主流地位。从汉代开始，《周易》经传便被奉为经典，直到清代，这一长达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中国学术史上被称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易学昌明，有关《周易》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达数千种之多。

《周易》之所以能够居于群经之首的地位，早期是得益于司马迁的推重。司马迁以史学名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易学家，他作史学巨著《史记》的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周易》的智慧和核心价值观，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这是一个有关“天人之际”的命题，“天人之际”也就是一个阴阳分合、对立统一关系的问题。到了东汉时期，《周易》被看作是圣帝明王致太平之书，人们认为帝王应该发挥、运用《周易》的原理，创建出太平盛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正式把《周易》视为群经之首，并且得到朝廷的认可。于是，《周易》便从所有的经书中脱颖而出，成为群经之首。此后，《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历代有识之士学易、研易，他们或以易名家，或以易立说，莫不受到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运用《周易》的原理经纶天下，治国安邦。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兴起，《周易》、《老子》和《庄子》三部学术经典受到尊崇，合称为“三玄”。王弼的《周易注》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易学著作，王弼易学“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又被称为玄学易。唐代的孔颖达奉命编写《五经正义》，就是以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为本，注疏《周易正义》，位居《五经正义》之首，成为唐宋及后代士人的必读之书。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指出，《周易》以卦爻之象信效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把《周易》看作是圣帝明王致太平之书，关乎国家战略和最高决策，这种认识与汉易、魏晋易学一脉相承。宋代是易学发展的繁荣鼎盛时期，北宋一朝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以易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的。如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易学造诣很深，胡瑗、孙复、石介和李觏等易学大师都受到他的奖掖和鼓励，游于范仲淹门下。他们以胡瑗为首，以“明体达用”为总纲领来研究《周易》，把研究、弘扬易学看作是复兴儒学的理论基础和配合庆历新政的重要举措，掀起了《周易》研究的高潮，促成了宋代易学的繁荣。北宋易学“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以义理派易学为主流，胡瑗提出的“明体达用”思想

成了后世学者治易的学术纲领和易学研究的依归。王安石也是精通易道，作有《易解》、《九卦论》等易学著作，与他的《三经新义》等经学著作一起，构成荆公新学的体系，成为熙宁变法的理论基础。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等北宋五子把易学研究往更高层次继续推进，致力于儒家宇宙本体论和价值本体论的探索，初步建立起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到了南宋，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著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构筑起一个完备的易学体系，把易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高潮。元明时期，易学更是倍加受到重视，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易学成为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核心。如张居正就极为看重《周易》的“涉世妙用”，注重汲取《周易》中蕴涵的政治智慧，用以指导现实生活。在清代的《四库全书》中，《易》类位居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的经部首位，延续了群经之首的地位。总之，《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在中国历史上倍受尊崇，从天子、大臣以至士庶平民，无不认真研习《周易》，将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修齐治平之基。据粗略统计，历代研究《周易》的著作共达三千多部，蔚为大观。这座易学思想的宝库，也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

中国历代真正的儒家学者和主流的正统意识，始终是把《周易》视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只有理解和把握《周易》，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和主流思潮。《周易》的智慧和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和谐就是阴阳和刚柔的辩证统一，就是既要自强不息，又能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①。易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也是异彩纷呈、古老深远而又勃发日新的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有宋一朝，文化璀璨绚烂，儒学复兴，名士如云，士气高涨，更是易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王国维对宋代文化推崇有加，他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

^① 《周易·乾·文言》。

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① 陈寅恪先生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② 徐芹庭先生也认为：“宋代武功虽不盛，然文化与学术之成就则颇大。”^③ 以上诸位先生所言，是谓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古代达到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思想来源就是《周易》。《周易》经传以其独特的思辨能力、完整统一的哲学体系成为儒家学者用以复兴儒学，辟除佛老的有力思想理论武器。“北宋仁宗朝起，学风崇尚独创，崇尚新奇，注释《周易》者更可以借解经的形式充分阐述自己的政治、伦理观点，甚至映射时政。”^④ 这也是《周易》在宋代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⑤ 这里揭示了《周易》的发展脉络，特别是指出了王弼扫除象数之后，《周易》“义理”学的发展阶段：一是魏晋时王弼以《老子》《庄子》玄理解《易》，二是北宋的胡瑗、程颐以儒家学说释《易》，三是南宋的李光、杨万里以史证易。其中的两个阶段都在宋代，而象数易学的陈抟、邵雍一宗也在宋代，易学的两派六宗，至宋始备。由此可见《周易》在宋代受推崇的程度和易学研究之盛况。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宋代易学与汉代易学并称，地位显要，影响巨大。自《周易》位居群经之首以来，历代学者研究易学之盛莫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于《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70页。

②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543页。

④ 王铁：《宋代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⑤ （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过于宋代。据统计,《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共收集历代学者有影响的易学著作 167 部,其中宋代易学著作就达 57 部,占三分之一强。宋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学家们都是通过解《易》释《易》来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如范仲淹、欧阳修就分别有《易义》、《易童子问》等重要易学著作传世,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初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实由范仲淹和欧阳修开启风气之先,他们两人是当仁不让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庆历新政的精神领袖和先行者。范仲淹的《易义》是宋初最早的义理派《易》学著作,成为后来程颐作《易传》的蓝本。北宋的诸位大儒,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周敦颐、刘牧、张载等,或者是范仲淹的弟子,或者同范仲淹有密切的关系,无不受到范仲淹的奖掖和提携。因此,范仲淹是当之无愧的宋代第一人。欧阳修则是文学、经学、史学均可为宗师。在他们身后,有宋一代学术和思想的天空星光灿烂,大放异彩,诚可谓登峰造极。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是根植于《周易》和易学这一深厚的思想源泉和文化沃土。

冯友兰先生认为,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一个民族是要有民族精神的,没有精神上的凝聚力,没有文化上的集体认同感,这个民族就称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民族精神不是静态的东西,更不是由什么权威规定下来的,它有其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周易》这本书恰好完整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生、成长、定型的全部历史。《周易》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个智慧就是和谐,其最高境界就是太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民族人文和思想文化不断整合的过程,早在尧的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整合,经过了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到了汉代又整合了。以后的历史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以整合、统一为主流。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余敦康先生认为,《周易》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命题,体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共同特征,融汇为体现了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谐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完整地表述天人合一的内涵与外

延，这里的“道”分开来讲有天道、地道和人道，包括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两个方面；合起来说则是中国思想所普遍追求的那种“由是而之焉”的道，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其理想目标就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谐。“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总原则，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是拨乱反正之书，饱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基于这种浓厚的忧患意识，在《易传》的和谐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经纶天下、建功立业的社会政治实践精神。对于处在积贫积弱危局之中，无时不求一奋祖宗之烈，振兴中原王朝的宋代士大夫们，这种忧患意识和事功思想表现得尤其炽烈。

《易传》所倡导的人生理想观对中国思想文化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一脉的精神动力，许多志士仁人都将其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践履。真正能称得上孔子所谓“国之大臣”的范仲淹，更是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最强音。“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成了有宋一代士大夫群体的思想共识和时代标志。《周易》经传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无疑也成了北宋士大夫们追求变法图强，革新政治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在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周易》所蕴含的伦理和政治意义往往要超过其哲学意义。重人事轻天道，以天下为己任，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北宋士大夫们，更是高度重视与发挥《周易》的经世功能，将其作为拨乱反正，改革除弊的理论指导与思想来源。

北宋年间，在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内忧不断，外患频仍，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累积已久的弊端和危机，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纷纷以《易》立论阐说，上书直指时弊，建言改革方略。许多改革思想在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上明显地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并且有些思想还是通过解《易》、述《易》表达出来的。如崇德尚德观念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之一，《周易》重视和强调对人的道德要求，《易传》三陈九卦，反复论述德的重要性，指出“不恒其德，或承其羞”，以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防止人生和社会各种忧患的根本。范仲淹基于《周易》崇德尚德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想，提出了以德为治，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宽猛相济的政治主张。他写了大量专论，充分论

证了为政必须以德教化人民。范仲淹基于《易传》的通变理论，提出了“法制有立，纲纪再振”的改革主张，推行庆历新政。他认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所谓“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得人则治，失人则乱”^①。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兴办学校、改革科举、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欧阳修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理想，他在其著名的《本论》中提出了节财、用兵、立制、任贤、尊名五项改革措施，并提出了“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的辟佛主张。

李觏立足于《周易》阐理发论，热情地为庆历新政鼓与呼。他在《易论》中根据《周易》的基本原理，针对宋代政治生活中的时弊，以《屯》《蒙》《师》《临》《恒》《涣》《同人》等卦为例，论述君臣关系，研究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指出只有合理地处理君臣关系，按照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的原则结成和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取得改革事业的成功。李觏把土地问题看成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他针对北宋不限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严峻社会现实，提出平土、均田、限田等主张，要求实行相对均平的经济政策，强调要防止巨商大贾的兼并，使用平准、平籴等措施加强国家对商业的控制，要求限制土地、财富的过度兼并和集中，改变贫富严重悬殊的状况，将《易传》的太和、中正思想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来，使社会各等级阶层和谐相处，以保持社会稳定。

王安石是北宋变法改革的旗帜，他著有《易解》，阐释《周易》的通变思想，作《九卦论》，提出了“辨义行权”的权变思想，为变法改革张目。他的易学思想是其荆公新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推行新法的重要思想武器。

司马光的易学思想与其史学和政治思想交相辉映，他提出人君要有仁、明、武三德，治道有任官、信赏、必罚三要，是为治国之要道。他力陈《五规》之状，提出了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规”作为革除弊政、

①（宋）范仲淹：《奏杜杞等充馆职》，载于《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页。

实行政治改革的总纲领，他还提出了“礼为纪纲”的思想作为治国之本。

程颢和程颐兄弟提出“天理”二字作为其易学思想的核心。程颐在其著名的《易传》中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作为其易学思想的总纲领，完成了儒学宇宙本体论和价值本体论的理论构建。他们兄弟对熙丰新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大中之道。

《易传》提出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命题，是一种兼容并包、综合百家而又超越百家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贯穿着一种中国哲学共通的精神，体现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对这一精神可以见仁见智，有着无限的诠释和发展空间。其实，在先秦时期，易学研究根本没有明显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并非儒家或其他某一家的专属经典，而是百家治易。其他经典也是如此，呈现百家治经的局面。因此，易学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易道广大，易学本身具有综合性、包容性、原创性和可诠释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易学研究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学术体系。因此，易学才在百家争鸣之中取得了既超越百家而又为百家所尊崇的地位。这一特点决定了易学研究有着宽广的领域和多维的视角，但这并非意味着易学研究是大而无当，杂乱无章的。易学思想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过程，易学研究也要适应和符合这个规律，反映这个过程。要言之，易学研究就是要以“明体达用”这一易学的根本宗旨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归，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政治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周易》为拨乱反正之书，对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和治乱兴亡的规律都有着精辟的论述，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师古用今，以《易》为师，以“明体达用”为指导思想，怀着“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精神去深入细致地研究易学思想。中国自秦以后一直奉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受到阳儒阴法的思想影响，内在有着强烈的君主专制倾向，容易形成君主专制政治。这种专制政治自身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总是不断地出现各种偏差，突出体现在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上，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表現就是发生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王朝易姓，社会

关系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再重新整合。余敦康先生指出：“《易传》根据以阴阳哲学为核心的易道来观察解释政治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受到历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重视，用于拨乱反正，克服由君主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机，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易传》的这种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和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都是息息相通的，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站在文化道德的立场上与专制主义思想相抗衡的强大精神力量。余先生还特别强调：“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民主性精华，应该以《易传》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突破口。”^②这对本书以易学思想与变法思想研究主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广铭先生曾经指出在宋史研究中“必须正确估价宋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说明，封建社会在其时还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还处于向前缓慢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已经到达了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③邓先生的这段评价应当说是比较确切的。本书对宋代易学思想和变法思想发展及其时代背景的认识就是基于这种对宋代历史地位的基本认识。

梁任公有言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类历史和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运动中的，并且社会运动又是最为复杂的运动形式，而《周易》则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通变之书。在中国历史上，易学的通变精神与社会的变法改革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易学指导变法，变法改革精神又不断充实补益易学思想。易学思想和变法革新精神的这种相互发明和滋养，在北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本书以北宋的历次变法改革为时代背景，旨在探究分析易学思想与变法思想的内在联系，寻求易学变革思想

① 余敦康：《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页。

② 余敦康：《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页。

③ 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3 页。